



社会组织如何激活乡村环境治理的内生动力? ——基于社会—生态系统适应性治理视角

蔡晶晶 王亚华

[摘要] 社会组织参与乡村振兴的潜力已形成共识,但其作为外来力量,如何与乡村在地主体建立稳定、有效、可持续的合作关系是现实中面临的重要挑战。关于社会组织如何推动乡村生态保护从外部依赖转向内生可持续发展的机制研究,仍较为薄弱。本文将乡村环境视为复杂社会—生态系统,从适应性治理视角分析社会组织激活村庄内生发展动力的多层次路径与动态过程。研究发现,外源型社会组织推动乡村环境内生保护动力的路径呈现“卷入—吸纳—赋权—激活”的特征:社会组织在操作层次通过信任将行动者卷入合作网络,在社群层次通过赋权、吸纳提升行动者的合作意愿和能力,进而在制度层次激活适应性情境下的集体行动。这种从“输血型”帮扶向“造血型”支持的转型,凸显了社会组织在推动乡村振兴和生态环境治理中的关键作用。这种“社区自助—协同供给”的环境治理模式形成了乡村振兴的新内源型发展路径,可推动乡村治理的现代化转型。

[关键词] 社会组织;乡村振兴;乡村治理;内源性发展;社会—生态系统

一、问题的提出

乡村生态环境是典型的公共池塘资源,这类资源的治理并不仅仅是一种纯生态的治理,还涉及人与自然的关系、社会合作和结构方面的因素。农村环境治理是长期以来人类与自然不断互动的产物,并不单纯是一种自上而下的制度建构。它事实上是一个社会—生态系统(蔡晶晶,2017:7-8),既包含了物理基础设施(如环境污染整治、森林巡护、资源监测)、社会基础设施(如信任、互惠、结构关系)等社会—生态

[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公众生成的数据与环境政策分析能力:驱动机制及其效应”(72274162),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的基本内涵和重点任务研究”(23ZDA047),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水资源分配和交易机制研究:博弈理论与经济分析”(72273119)。

[作者简介] 蔡晶晶,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教授;
王亚华,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长聘教授,通讯作者。

系统的关键要素,又容易受不同治理体制、集体行动的影响而发生资源利用问题,形成难以理解的复杂性。对乡村社会—生态系统的治理必须改变以往自上而下的寻求“万能药”的做法(Ostrom,2007),而应更多地依赖多样化的制度——自组织、市场机制和志愿机制等——形成一个具有多元化和恢复力的治理系统。社会组织不同于政府组织和市场组织,在乡村振兴中发挥着独特作用。乡村振兴需要包括除政府外的社会组织、企业等社会力量多元主体共同参与,充分利用社会力量的专业功能实现共治共享(刘闯等,2024)。当前,城市资源进入农村的过程中常常面临市场力量的异化与行政力量的失灵,使得乡村振兴的过程面临政府失灵、市场失灵和自治失灵三重困境(叶林,雷俊华,2022)。解决这些困境,既要处理好农民主体性缺失和村社组织化缺失的内源性发展动力问题,又要解决好外源性资源嵌入与村庄适应性发展问题。针对治理资源有限的农村社区,社会组织能否发挥更积极的资源整合作用,打造高度互嵌的多元共治局面?社会组织的服务和支持网络应该如何建构?应该由哪些创新理论来指导实践才合适?本文拟通过社会组织激活农村环境内生治理的实践案例来回答上述问题。

现有关于社会组织参与乡村治理的知识图景,多从某个单一的角度出发,分析治理责任主体(陈秋红,黄鑫,2018)、治理模式(姜利娜,赵霞,2020)、治理政策变迁(韩冬梅等,2019)和治理路径选择(杜焱强,2019;李南枢,何荣山,2022)等,治理对策比较静态和单一,忽视了不同使用者属性和物品属性下治理结构选择的动态性和适应性。本文将乡村环境视为复杂的社会—生态系统,添加系统性、适应性和层次性等维度,从适应性治理视角分析社会组织激活村庄内生发展动力的多层次路径与动态过程,有助于针对性研究乡村治理的不同发展阶段,更好地指导现阶段推进精准扶贫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政策实践。同时,本文特别强调了社会组织作为中介机构在农村环境公共服务供给中的重要作用。它们是以增强服务提供者的能力并为服务用户提供支持为主要职能的专业组织,通过信任、网络与制度机制激活村庄内生发展动力,进而推动乡村生态服务的共同生产,拓展了现有关于农村公共事务治理的研究。

二、社会—生态系统视角下乡村环境治理的发展路径

乡村社会—生态系统包含多个组成部分,如乡村生态环境子系统、使用者子系统(包括农户在内的各个利益主体)、治理子系统(相关治理部门)等,各组成部分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其中任何一种生计资本的缺失都可能造成生态多样性的损失,或者对当地传统文化和生态文明造成不可修复的破坏,不利于乡村社会—生态耦合协调发展。因此,需要将社会—生态系统治理现代化纳入乡村治理现代化。社会—生态系统治理现代化是一种以适应力为核心的治理转型,“旨在通过适应性的社会权利

分配与行为决策机制,使社会—生态系统能够在动态条件下可持续地保障人类福祉”(宋爽等,2019)。

在传统的治理范式下,制度通常被视为一种外在于管理过程的因素,而不是连接社会—生态系统的有机组成部分。而社会—生态系统的现代化治理理论更强调制度的内生性,认为一国政治经济制度是其社会经济、生态文明等多层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一国或一个地区制度的特殊性是其社会、经济、生态、文化、历史等因素特殊性的体现。理解和应对社会—生态系统的多稳态、非线性、不确定性、整体性以及复杂性,需要建立非对抗性的社会结构、权利分配制度以及行为决策体系,匹配社会子系统与自然子系统(宋爽等,2019)。奥斯特罗姆则从多维度治理的角度强调了控制的难度、了解不确定性的需要以及处理具有不同价值、利益、视角、权利和信息的人群和组织之间的广泛冲突的重要性。国内学者基于我国乡村治理的现实状况,对该理论加以应用和发展。例如,刘守英和李昊泽(2023)指出,权利影响收入,权利制度安排是影响农户收入变化的关键因素;王博和王亚华(2022)则认为,有效的乡村治理必须依赖合理的基层激励相容机制。中国乡村振兴所要处理的,是使用者子系统和生态子系统交互的复杂社会—生态系统问题。韧性乡村是社会—生态系统的组成部分,需要发挥社会主体功能,以实现乡村基本功能结构在风险应对中保持稳定(Perz et al., 2012)。从社会—生态系统视角看,乡村治理的目标是建立韧性乡村社区,注重乡村的适应性,而建设乡村适应性能力的关键是激发乡村内生发展动能,在耦合系统的多元互动中形成和增强适应能力,使整体不再是简单的部分加总,而是出现不同于“线性叠加”的增益。

这种适应性治理的主要逻辑是改变“自上而下”的政策导向,走向引导多元组织共同合作的治理格局,探索在不断变化、高度不确定和复杂的生态系统中的共管形式、内涵和机制。在社会—生态系统视角下,乡村环境治理的适应性能力包括农户个体层面的内生发展能力(操作层次)、乡村社区层面的协商合作能力(社群层次)和制度规则层次的自组织能力。

从资源系统来看,环境资源治理的核心是让乡村社会—生态系统更具“恢复力”。村庄在被干扰之后还能产生变化、重组,并保留原有的特征、基本机构和功能。1973年,生态学家霍林(Holling)首先使用了“resilience”一词来描述生态系统在遭遇自然或人为干扰后是否还能安然无事,或者即使遭受重创后也能迅速自我修复的能力。如果说生态恢复力是一个保持社会—生态系统稳定性的理论逻辑,那么适应性治理则是实现恢复力的政策机制。适应性治理强调根据变化的环境来不断学习,避免形成静态、僵化的管理方式,也即改变原本“自上而下”的政策导向,走向引导多元组织共同合作的治理格局。

从使用者系统角度,诚信是联系社会资本和集体行动的核心纽带。信任是针对

多个服务供给主体而言的,如社区、村落、社会团体等都能动员起来,在信息提供、市场支持、人才培育等方面为村庄提供相关专业服务。通过信任构建、社会学习和民主治理等手段,将生态服务价值更好地带入广阔的市场网络,使村民从可持续的经营中获得更大的利益。作为外源型社会力量,社会组织受志愿者精神的推动,在政策制定、执行和监督中具有道德优势,通过信任能够聚合各种志愿性社会资源,并通过赋权、吸纳返乡精英参与村庄环境治理的协商网络,提升行动者的自组织能力。

在治理系统中,社会组织同样可以发挥服务、组织和引导的功能,推动各主体通过协商对话、签署协议等形式建立信任,激活多主体共同参与的具有地方特色的适应性制度框架和政策体系。例如,协调地方和更大层次治理系统之间的关系,推动解决森林产权混乱问题。重点在于建立能够随着组织规模、自然环境、社会系统等因素变化而变化的适应性治理系统,避免一刀切,寻找与当地的生态环境、人文环境等相匹配的制度安排。

如图1所示,基于社会—生态系统适应性治理理论(Olson et al., 2004),村庄环境治理内生发展路径呈现一种“社区自助—协同供给”的模式,包含冲突解决机制、诱导规则服从机制、自组织治理或适应性共管机制等核心机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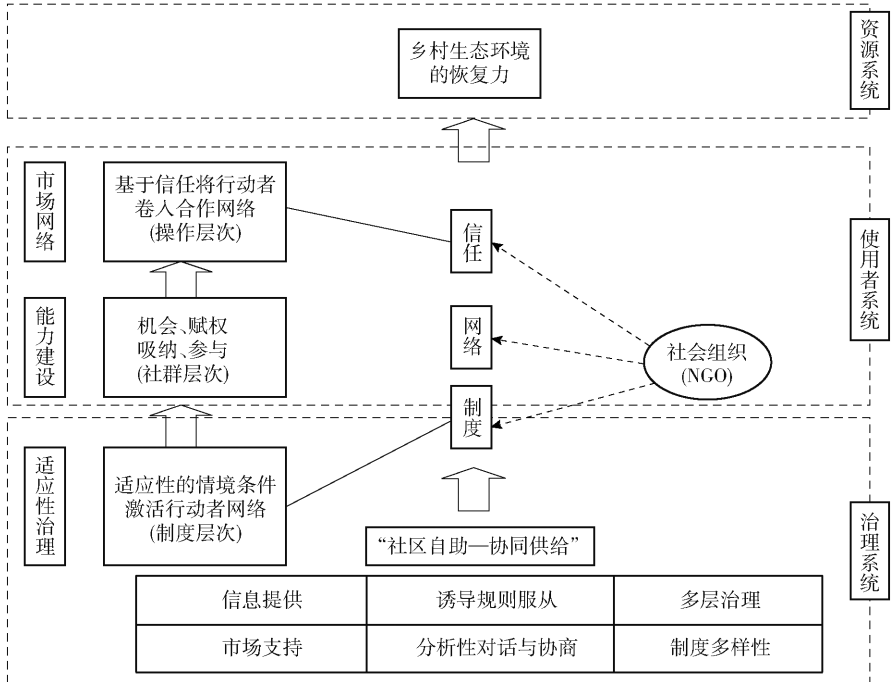


图1 社会—生态系统适应性治理视角下村庄内生动力的发展路径

三、研究设计

(一) 研究方法

案例研究适用于探究过程和机制问题(Eisenhardt,1989)。本文旨在运用案例研究探讨社会组织在农村基层实践中的复杂作用机制,通过案例中社会组织的行为特征和关键条件来拓展“乡村内生动力”的有关理论。基于案例的可获得性和典型性考虑,本案例研究的社会组织指在四川省P县H村长期开展活动的某“山水自然保护中心”(以下简称“山水”)。“山水”于2007年成立,是一家依托高校资源从事物种和生态系统保护的社会组织。P县由于地处大熊猫国家公园内,多个村庄都位于火溪河流域,是秦岭重要的水源地带,但并未得到很好的保护。亦有其他社会组织进入参与环境保护活动,如桃花源基金会在附近的L村开展活动,中国扶贫基金会以扶贫和乡村产业振兴帮扶为目标,在周边乡镇的J村开展帮扶。调研了解到,由于P县H村已经有“山水”进入,考虑到其他村庄也存在需要保护而未能得到保护的问题,且社会组织的使命各有不同,因此其他社会组织选择了符合自己组织使命的其他村庄。

将“山水”作为分析样本,主要有三个方面的理由。第一,H村是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一个缩影,是通过资源共有、利益共享、社区共建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典型;第二,社会组织的生态行动不完全是公益行动,而是一种促进村庄内生发展动力的重要催化剂,即通过多层次的制度路径激发社区参与,在生态、产业等方面实现有效的集体行动,是公共服务共同生产的鲜活实践;第三,在以资源环境治理为代表的农村公共事务治理中,对于如何通过借助社会组织激活村庄生态产品价值,本案例提供了可供参考的路径,也为社会组织有效激活村庄公共事务的自我管理和适应性治理提供了独特启发。

(二) 案例背景及素材来源

本文在选择案例时还有五点考虑:其一,社会组织参与农村环境治理超过五年,具备丰富的实践运作经验,从而保证其作为研究对象的学理价值;其二,农村环境治理的过程以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等相关目标为宗旨,从事环境保护活动或提供环境公益服务;其三,社会组织对村庄的扶持是关注村庄内生发展能力建设的“造血型”支持,与以往的“输血型”帮扶做法有本质区别;其四,社会组织、社区村民在介入基层治理体系后使得环境治理的多元主体互动更频繁,拓展了治理主体所能支配的资源总量或是搭建起长效治理平台;其五,社会组织与基层党政部门、村民自治组织、企业等多元利益主体建立广泛联系,从而保证可通过调查不同相关方获得客观充分的信息。

本文以访谈和观察得到的一手资料为主要研究数据来源(见表1)。(1)深度访谈。课题组于2019年、2021年和2023年的1~2月到H村,围绕农村生态环境治理的常态化机制开展社会调研,与四川省大熊猫国家公园管理局、M市国家公园管理分局、P县林草局、卧龙自然保护区管理局、老河沟自然保护区、木皮和木座乡乡镇干部开展了多次座谈会,每次近4个小时;并对主要负责人进行了关键人物访谈,如对国家公园管理局社区发展与协调处处长、M市国家公园管理分局局长、县林草局生态处处长、卧龙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副局长、Q乡乡长、H村书记及返乡青年代表和村民等共约40人进行了每次3~5小时的访谈。(2)参与式观察。研究团队分别于2019年和2023年的1月深入H村开展了一个月的实地观察,实地参与旁听村民会议6次,获得会议纪要15份、保护小区管理计划6份、组织章程1份、火溪河流域保护行动计划1份、H保护小区项目实施方案1份、基础调查报告4份、项目评估报告12份和村民“一事一议”会议记录15份,并获取大量生态资源、生态多样性数据和政府内部资料等一手素材。(3)文档资料。课题组成员在调研过程中收集了调研单位相当完备的文档资料,包括自然保护中心申报资料、工作总结和年度报告等内部档案材料,相关的调查报告、媒体报道、报刊文献、社区资源图,养蜂合作社、旅游合作社等农民社团内部会议资料等。以上三个方面的数据相互补充、验证,共同构成了本研究的实证资料基础。

表1 调研内容与方法

目标	调查内容	产出	工具方法
社区经济本底建立	社区年度家庭经济数据	家庭收入、支出数据	问卷、访谈、乡政府资料
社区产业发展	养蜂产业与合作社现状	现状评估	访谈、问卷、快速乡村评估
	发展意愿	发展意愿清单	问卷、关键人物访谈
	社区资源利用	资源图、季节历补充	社区资源图、季节历
社区与森林和水的关系	社区用水	水源区域及情况	社区资源图、访谈、踏勘
	社区资源管理制度	相关资源管理制度及资源利用	访谈、参加村民“一事一议”
	社区林地资源分布	林地资源分布区域图(资源利用补充、林相)	访谈、社区资源图
社区组织现状	社区公共事务管理	社区公共事务态度、事务决策机制	二手资料、访谈、问卷
	社区组织能力现状	社区对处理公共事务能力的现状及能力需求	问卷、快速乡村评估、参与观察
社区保护现状	社区保护意识	保护意识评价	问卷、访谈、参与观察
	保护工作情况	形式、组织情况以及社区参与情况	访谈、问卷、参与观察

四、社会组织助推乡村环境治理内源性发展的个案分析

本文将H村环境治理情境视为一个复杂的社会—生态系统,涉及资源系统、使用者系统、治理系统等多个互动的子系统。从资源系统来看,P县位于四川盆地西北部,地处青藏高原向四川盆地过渡地区的东缘地带,长江中上游二级支流的涪江上游,素有“天下大熊猫第一县”之美誉。森林覆盖率74.14%,生物资源丰富,是M市重要的生态腹地和水源涵养地。P县Q乡H村辖4个村民小组、121户、389人。H村生态区位重要,东连唐家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东南邻老河沟公益保护地,南邻余家山县级自然保护区,西面是小河沟省级自然保护区,北面是薤子坪和摩天岭沟自然保护区,位于大熊猫岷山中段大熊猫中心栖息地,属于重要的生态走廊带。H沟是火溪河径流量第三大支流,也是Q乡和H村的水源地,生态水源功能非常重要。

从使用者系统来看,H村虽然自然资源丰富,却曾是P县贫困村之一,生态保护方面的投入以中央财政和地方政府补贴为主,社会公益资金占比很小,而政府在国家层面的补偿资金有限,林农仍承担了大量的保护成本,没有获得足够的补偿,也缺少有效的替代生计。2009年,在地方政府部门的协助下,社会组织开始参与H村的治理。在社会组织和众多返乡青年的努力下,H村成立了由村民组成的森林河道巡护队,长期开展大熊猫栖息地的专项巡护、网格化监测、反盗猎、森林防火、河道巡护、反电毒鱼等行动,逐渐形成了生态环境自组织治理的新局面。

从村庄治理系统来看,H村林地权属复杂,40000亩集体公益林分别属于平武林业发展公司、木皮乡政府、H村村委,还有的是部分村民个人的自留地。各权属方因边界不清晰,出现互相推诿保护责任的现象。村民在大熊猫栖息地内的盗猎、盗伐、挖药、毒炸鱼行为普遍存在,沟内有10多户蜂农发展养蜂,春季挖笋、挖野菜,秋季采摘猕猴桃等野生水果和中药材,对大熊猫栖息地和生态环境造成一定影响。如何协调经济发展和生态保护,如何整合资源和协调各利益相关方协作供给H村的生态环境服务,实现自然资源的可持续管理和恢复,成为H村面临的主要挑战。

(一)操作层次路径:通过信任将潜在行动者“卷入”到合作网络中

在制度理论学者看来,信任指一种合作的行为倾向,意指使行动者采取互惠策略的行为偏好,它是一种相对独立的内在于个体人性中的非自私的行为动机。信任在超越公共池塘资源治理的困境中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Rothstein, 2005)。不断学习与规范的培育是个人可能获得更高信任水平的基础。当个体获得来自他人的更深层的信任时,会带来双方更多的合作及更高的利益回报,而这作为一种反馈机制又进一步强化了个体对以往正面或负面经验的吸取。

在以往的乡村治理模式下,政府具备自上而下的动员力与控制力,是乡村治理

的主导力量,往往通过输入各种政策补贴、财政资源等推动乡村人居环境整治,如建设乡村公路、美化房屋外观、修缮景观工程等“输血型”的公共服务供给。村民对基层干部的“信任”延伸为“有事找政府”的惯性思维,认为政府具有提供公共物品的不可推卸的责任。但在取消农业税后,村庄公共服务供给引入了更多元化的参与主体,政府变成公共治理中的服务者和积极行动者,与企业、社会组织、公民等主体开展公共服务的合作生产。社会组织作为外来力量是新合作网络构建的重要行动者,拥有主动作为的强烈意愿,具备资金支持和资源嫁接的能力以及设计公益项目和建立合作网络的丰富经验。

首先,社会组织通过建立信任,设法将潜在行动者“卷入”到合作网络中。为了获得老百姓的支持,社会组织挨家挨户做工作,与村民谈心,了解村民生活中的困难,并切实为其提供物质上的帮助。例如,邀请技术专家为老百姓提供种地、养蜂等培训,辅导村民的孩子做作业,协助照顾留守儿童,等等。在面对面的沟通中,通过诚恳的交心和生态保护知识的普及,村民慢慢意识到,村庄生态环境保护与生计并不完全矛盾,配合保护生态环境能带来更长远经济收益。并且,生态产品价值长时间获得的回报比短期的利益更大。如果村民不愿按照一定的规则来使用村庄资源,无法形成合力,村里的生态资源很容易耗竭。

其次,社会组织积极与各种利益相关者沟通并获得其支持,畅通筹资渠道。社会组织反复与各种利益相关者沟通,通过监测数据和成果共享的形式,签订协议形成利益分享机制。当地林业局人力资源部门做了沟通、培训、资金投入等工作,将H村作为案例上报至上级部门。社会组织则积极争取各类项目,与科协、媒体、企业等建立商业合作关系,为社区争取更多的环境保护资金支持。在这个过程中,社会组织与村民逐步建立信任,为村庄构建起金融资本、人力资本等可持续生计资本,更好地消解制度外冲突,成为村庄正式治理的有效辅助机制。

(二) 社群层次路径:通过赋权和吸纳参与建构使用者系统的能力

赋权是异质性行动者间的一种利益协调机制,确定利益诉求并提供合理的利益保障能够激发行动者的兴趣,也是核心行动者确保其他行动者扮演各自角色而不发生“反叛”行为、维系整个网络良性运行的手段。社会组织通过增加互惠性,挖掘潜在互惠利益,“吸纳”村民参与环境公共服务供给。

社群层次的内生发展路径不仅立足于赋予农户明确的权利,还要加强农户运用这种权利的能力,使其能够根据更高层次的参与能力、发展能力改善自身的福利状况。H村生态环境的适应性治理,既改善了个体自身利益,又维系了整体社会公平的制度变迁;既是一个个体权益明晰的过程,又是一个再组织化和社区合作经济的发展过程;既是一个市场经济发展的过程,又是一个建立有效治理体系的过程。

2012年以来,社会组织长期陪伴H村成长。它改变了不利的制度或条件,通过

不断学习促进 H 村自治能力的成长。它利用自身的专业特长,通过电商销售模式打通农产品销售和运输环节,为农产品进入市场提供了便利。它开展森林巡护和乡村绿色领导力培训,设立农民田间学校项目,在社区治理、能力建设、合作社经营管理和社区产业技术发展等方面开设了不同形式的课程与培训,并通过养蜂合作社和产业发展等措施,消解了生态保护与民众增收的矛盾,促成了一个“正反馈”的机制来实现利益共享。它把林草局、乡政府、国有林的管理单位以及村上林地的权属所有者集合到一起,动员关键利益大户,带动其他村民签订环境保护与发展协议,组织村民协商制定补偿机会成本的方案。

社会组织通过分析性对话与协商,构建利益共同体网络,增进规则服从。村里成立养蜂合作社,对水质要求高,因此保护协议的内容包括水源和植被保护:监测有多少蜜源植物,量够不够,有多大生产量。在社会组织的努力下,合作社取得了一些发展,村民的想法也逐渐改变。村民意识到养蜂必须要有良好的环境资源,有干净的水,否则养不好;发展冷水鱼养殖,首先得把资源保护下来,才有发展的可能性。此外,社会组织会定期对有志于服务家乡的返乡青年开展培训,培育村庄人力资本。通过举办自然教育宣讲活动,开展巡护员野外生物多样性保护知识培训等,帮助村民重新认识人与自然的关系,让村民从被动保护变为主动保护,通过挖掘潜在互惠利益“吸纳”潜在行动者。

(三) 制度层次路径:建立适应性的情境条件激活行动者网络

社会组织通过动员调动所有行动者释放效能,发挥作用,推动问题解决和行动方案实施。在适应性情境中激活村庄环境保护的内生发展动力,在乡村振兴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价值引导作用,增强了网络的黏性和可持续性。这种作用促使多元主体逐步成为一个以共同使命为基础的团体。社会组织的扁平化结构和立足基层的特点,使其在应对风险时能更灵活、高效地落实政策意图。通过非对抗性的社会网络,社会组织能够将各类地方性合作主体联结起来,强化共同行动与集体决策的能力。在风险应对中,社会组织作为桥梁和纽带,促进了政府、企业、合作社与农户等多方主体之间的积极互动,通过协商对话、签署协议等形式建立多元主体间的信任,最终实现整体的共同利益。此外,社会组织与其他参与主体通过博弈制定规则,规范乡村振兴实践中的各方行为,从而确保自主治理的可预测性和稳定性。由于受到志愿者精神的激励,社会组织在政策制定、执行与监督中展现道德优势,能够有效避免“集体行动困境”和“囚徒困境”,从而最大化地保障公共利益(李南枢,何荣山,2022)。

在此过程中,通过分层次的治理体系,村庄环境治理从“社会组织推动”转变为“社会组织逐渐退出,村民自己管理”,并形成多样性的制度。“制度体系就能够像一个生命体一样,根据农村生态环境问题的不断变化而形成有针对性的制度供给,动态

改善促进集体行动的关键要件,最终实现农村环境治理集体行动的持续激活”(苏毅清等,2024)。适应性治理的策略为:(1)根据当地生态条件,提出因地制宜的概念性模型;(2)研究和制定管理规划,确定目标和需要采取的行动;(3)研究和制定合理的监测规划;(4)实施管理规划与监测规划;(5)仔细分析信息并充分讨论结果;(6)利用结果去改善与学习,重复之前步骤。

首先,因地制宜提出组建H村流域自然保护小区的规划建议。H村林地权属复杂,40.3平方公里的山林分割成个人所有林、村(社)有林、乡有林和国有林四类。个人所有和村社所有的林地由关坝村管理,乡有集体林归木皮乡政府管理,国有林归P县林业发展公司管理,各个权属部分的界限分布不清、面积不清。2014年11月,“山水”协调H村各林地权属方召开自然保护小区可行性分析研讨会。2015年,关坝村通过村民“一事一议”同意将H村林地纳入H保护小区,同时与乡有林和国有林合并向P县林业局申请建立H沟流域自然保护小区。经M市林业局审核,2015年9月获得林业厅批复同意建立自然保护小区,并作为四川省深化体制改革的试点之一,探索大熊猫保护区外集体林管理和小流域治理新模式。

其次,研究和制定管理规划与监测规划。2015年11月,社会组织以H村民为主体,通过愿景构建、问题分析、目标确定、管理架构梳理、资金机制建立、年度计划编制等环节,形成H村保护小区管理计划,用于指导保护小区的保护与发展工作。具体包括保护野生动物种群,缓解人兽冲突;森林火灾、伐桩的动态监测与盗挖药材巡护;河道管护,水体和地表面源污染治理;对火溪河流域冷水鱼的电鱼、网鱼、毒鱼等行为进行监管,并开展增殖放流等。

再次,实施管理规划与监测规划,仔细分析信息并充分讨论结果。社会组织邀请专家、在地合作伙伴和当地社区,共同讨论制定能够最大限度整合各方资源的H村保护小区长期保护和产业发展规划。成立H社区保护与发展基金,以基金为依托对接来自市场返利、社会资金捐赠和社区内部集体产业分红的资金,推动规划的实现。例如,协助成立H养蜂专业合作社,并推动蜂蜜的有机认证,建立通过市场购买保护的反馈机制;先后引进投资公司和“山水”伙伴公司开发生态产品,支持地方的发展,并将获得的利润部分返还H社区(市场购买社区守护行为)。

最后,利用结果去改善与学习,进行适应性调整。社会组织嵌入H村生态系统,长期陪伴和培育村庄内生的公共服务能力,在长期的协商治理实践中,利用结果建构价值共识,与村民渐近磨合和共同成长,形成了适应性的治理格局。“山水”每隔一段时间会到村里看看,召集H流域自然保护中心理事一起开会,检查巡护人员的巡护日志和红外线相机拍到的野生动物影像,分析生态多样性的数据变化,盘点生态的威胁和挑战,制定相关的评估指标,作为下一阶段对H村继续资助的依据。村民通过“一事一议”参加评估,在开放性讨论中形成共识,以共同的历史、经验、敏锐的感

知力和技能,在谋生过程中与周围环境相互浸入,在建构周围世界的同时形成既有界限又有开放性的地方知识体系。这种朴素的社会规范与村民的微观互动体验之间形成的纽带型资本,面向周边地区传播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理念,促进 H 村适应性内生发展的经验分享和学习行为。H 村收到来自各种途径的反馈和声音,从而能够对环境做出适应性调整。

五、研究结论、贡献与展望

(一) 研究结论

本文基于社会—生态系统“适应性治理”理论,构建“外援性资源输入—内生动力激活—协同供给”的治理逻辑,并以四川省 P 县 H 村环境自组织治理实践为例,分析社会组织激活农村环境内生治理动力的路径,为相关社会力量参与乡村振兴提供参考。本研究发现,外源型社会组织推动乡村振兴环境内生保护动力的路径呈现“卷入—吸纳—赋权—激活”的特征:社会组织在操作层次将行动者卷入行动网络,在社群层次通过赋权、吸纳提升行动者合作意愿和能力,进而在制度层次激活适应性情境下的集体行动。早期,社会组织基于政府的合作开展“输血式”帮扶,通过信任机制培育村庄自然资本和物质资本;中期,社会组织长时间陪伴村庄,以降低贫困障碍的“造血式”扶持方式,提升村庄人力资本和金融资本,建构利益相关者网络,促进有利于分析性对话的集体行动;后期,基于情境与规则相互匹配角度,培育村庄社会资本、文化资本,构建村庄适应性治理的内生动力。在使用者系统中建立信任,搭建协商网络与开展制度建设,通过分析性对话,增进村民规则服从,构建起村庄生态保护的内在秩序。这种以“社区自助”为核心的适应性治理模式,代替了过去“政府依赖型”的乡村社区建设路径,在乡村环境卫生事业的发展中取得诸多突破,形成了“政府引导—社会组织协同—村民参与”的新型共治框架,体现出“强国家治理—强社会发育”的新治理秩序。“强国家治理”指当地政府为乡村社区发展提供一系列扶持计划和补贴政策,是一个效率更高的“服务与引导”者,而非以往国家对社会的“全能控制者”。“强社会发育”指乡村社会力量的崛起、社区精英等内生力量的激活以及民众对乡村社区公共事务的广泛参与。因此,“社区自助—协同供给”的乡村建设路径,可有效推动乡村治理的现代化转型。

(二) 研究贡献

本研究在一定程度上打开了社会力量助推乡村振兴内源性发展过程的黑箱,为传统外源型社会组织悬浮化问题(钱坤,2020)提供了一个新解释,有助于更深入理解当前我国乡村振兴政策执行异化的症结。

第一,既有文献阐述社会组织对于乡村治理的作用经常涉及内源式发展(en-

ogenous development) 和外源式发展 (exogenous development) 理论的关系(张文明, 章志敏, 2018), 探讨乡村振兴究竟要依靠乡村内源型在地主体还是外源型社会力量的协助, 但已有讨论既无法回应内源发展的持续性动力源于何处(方劲, 2018), 又没有解决外源型社会力量的情景适应性问题(邓燕华, 2019)。近年来的实践愈发表明, 这两者并不排斥, 地方社会的发展离不开两种力量的“内外融合”, 即整合式的新内源发展理论 (neo-endogenous development) (朱娅, 李明, 2019)。相较于已有的内源式发展和外源式发展理论而言, 本研究进一步验证了新内源发展理论的实践经验和发展方式的合理性, 即乡村振兴的关键在于构建地方的制度能力, 充分发挥社会组织等外部力量的网络连接作用, 激活内部资源, 实现乡村治理内源型发展动力的持续形成。

第二, 以往乡村振兴研究多将社区治理视为孤立系统, 忽视了它与生态环境、资源系统、使用者行为、治理组织的关联性, 并且在经济属性上表现出多样性和层次性; 或局限于对某个阶段问题的静态分析, 未能从社会—生态系统整体性与动态性视角考察资源治理中人与自然的耦合关系。本研究指出, 农村环境治理是一项集经济、社会、文化、生态于一体的动态演进的系统工程, 应从社会—生态—文化整体性的视角看待社会组织等外在资源的嵌入与村庄生态环境之间的互动实践。生态系统的维护与开发不仅要注重功能性、实用性、审美性, 而且要关注背后所蕴含的群众情感和历史文化底蕴。因此, 应将乡村视为一个社会—生态耦合系统, 强调通过制度、经济、公众参与等途径展现或保护生态系统内部及其与外部因素之间的共生性; 强调多样化的乡村振兴实践中合作过程和知识的多样性, 探索在不断变化、高度不确定和复杂系统中的适应性共治形式、内涵和机制。

(三) 研究不足与展望

本文采用个案研究方法, 深入分析“山水”在 H 村的实践, 以揭示社会组织在乡村振兴中发挥作用的深层机制。本文的结论具有启发性, 但不一定具有广泛代表性。未来的研究可以进一步探讨具有不同背景、类型和服务形式的外源型社会组织在乡村治理中的多元主体合作案例, 分析其有效破解合作治理难题的机制, 从而提高研究结果的外部效度。同时, 可以采用调查问卷或相关量表更精确地测量参与者的认知和偏好, 并通过科学抽样方法收集更大规模的数据, 以验证相关假说并增强研究结论的信度。此外, 未来的研究可扩展个案范围, 将研究对象纳入村委会和乡村内生型社会组织等当地主体, 开展合作网络的比较分析, 进一步探究乡村治理内部的复杂作用机制, 从而得出更具信度的研究结论。

[参考文献]

- 陈秋红,黄鑫,2018.农村环境管理中的政府角色——基于政策文本的分析.河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54-61
- 邓燕华,2019.社会建设视角下社会组织的情境合法性.中国社会科学(6):147-166
- 杜焱强,2019.农村环境治理70年:历史演变、转换逻辑与未来走向.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5):82-89
- 方劲,2018.内源性农村发展模式:实践探索、核心特征与反思拓展.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24-34
- 韩冬梅,刘静,金书秦,2019.中国农业农村环境保护政策四十年回顾与展望.环境与可持续发展(2):16-21
- 姜利娜,赵霞,2020.农村生活垃圾分类治理:模式比较与政策启示——以北京市4个生态涵养区的治理案例为例.中国农村观察(2):16-33
- 李南枢,何荣山,2022.社会组织嵌入韧性乡村建设的逻辑与路径.中国农村观察(2):98-116
- 刘守英,李昊泽,2023.权利开放与农民的共同富裕.学术月刊(8):41-60
- 刘闯,王亚华,刘璐,2024.专业注入与集体激活:社工参与农村公共服务供给的实践逻辑——以北京市赵庄子村为例.中国农村观察(1):45-64
- 钱坤,2020.从“悬浮”到“嵌入”:外生型社会组织参与乡村治理的困境与出路.云南行政学院学报(1):25-30
- 宋爽,王帅,傅伯杰,等,2019.社会—生态系统适应性治理研究进展与展望.地理学报(11):2401-2410
- 苏毅清,覃思杰,舒全峰,2024.制度路径融合激活农村生态环境治理集体行动的机制——基于嵌套制度体系分析框架.中国农村经济(7):161-184
- 王博,王亚华,2022.县域乡村振兴与共同富裕:内在逻辑、驱动机制和路径.农业经济问题(12):73-81
- 叶林,雷俊华,2022.社会力量助推乡村振兴的内源性发展路径研究——基于“振兴村”试点的分析.理论与改革(1):87-101
- 张文明,章志敏,2018.资源·参与·认同:乡村振兴的内生发展逻辑与路径选择.社会科学(11):75-85
- 朱娅,李明,2019.乡村振兴的新内源性发展模式探析.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学报(6):124-130
- Eisenhardt, Kathleen M., 1989. Building theories from case study research. The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4):532-550
- Olson, Per, Carl Folke, Fikret Berkes, 2004. Adaptive comanagement for building resilience in social-ecological systems.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1):75-90
- Ostrom, Elinor, 2007. A diagnostic approach for going beyond panaceas.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39):15181-15187
- Perz, Stephen G., Liliana Cabrera, Lucas Araújo Carvalho, et al., 2012. Regional integration and local change: road paving, community connectivity, and social-ecological resilience in a tri-national frontier, southwestern Amazonia. Regional Environmental Change(1):35-53
- Rothstein, Bo, 2005. Social Traps and the Problem of Trust.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How Do Social Organizations Activate the Endogenous Drivers of Rural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From an Adaptive Governance Perspective on Social-ecological Systems

CAI Jingjing WANG Yahua

Abstract While the potential of social organizations to contribute to rural revitalization is widely recognized, a key practical challenge remains: how can these external actors forge stable, effective, and sustainable partnerships with local stakeholders? Existing research offers limited insight into the mechanisms through which social organizations can shift rural ecological protection from a model of external dependency to one of endogenous,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Conceptualizing rural environments as complex social-ecological systems, this study adopts an adaptive governance lens to analyze the multi-level pathways and dynamic processes by which social organizations catalyze a village's internal developmental momentum. The findings indicate that exogenous social organizations typically follow a pathway characterized by “engagement – incorporation – empowerment – activation”. At the operational level, they leverage trust to draw actors into collaborative networks; at the community level, they enhance the willingness and capacity of local actors to cooperate through empowerment and inclusion; and at the institutional level, they activate collective action suited to adaptive contexts. This shift from “transfusion-based” assistance to “capacity-building” support underscores the pivotal role of social organizations in advancing rural revitalization and ecological governance. The resulting model of community self-help and co-provision constitutes a new endogenous pathway for rural development and facilitates the modernization of rural governance.

Keywords Social organizations; Rural revitalization; Rural governance; Endogenous development; Social-ecological systems